

晚清教会大学对现代学校教育的影响研究

王颖清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晚清时期，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些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到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枢纽和桥梁作用，特别是对港澳台教育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对教会大学历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港澳台地区教育发展的理解，实现教育领域的接轨，而且对于认识和评价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教会大学；传教士；学校教育

DOI:10.69979/3029-2735.24.7.021

1 教会大学兴起原因

19 世纪中叶之前，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还是相对零星和局部的。但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主权遭受了严重的侵犯，清政府的军事和政治失利引发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些条约不仅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造成了巨大冲击，还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和教育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特权保障。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并设立学校。1842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须一律保护。”^[1]这一条款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教活动提供了法律支持。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广州这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成为了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和兴办教会学校的推广基地。这些地方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为传教士提供了良好的传教环境。在这些地方，传教士们建立了大量的教会学校，通过教育这一渠道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传播。随着《南京条约》之后的其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教会在华传教和兴办学校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扩展。这些不平等条约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然而，这种交流和融合是建立在不平等和侵略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含义。总之，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境内大规模传教办学，这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我们仍然要铭记历史教训，珍惜民族尊严和主权。

在中国古代，教会学校并未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其发展之路充满曲折。但历史的进程总是令人意想不到，在 19 世纪 60 年代，清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重

失利和太平天国的冲击后，内外交困之下，一场名为洋务运动的改革浪潮席卷而来。这场运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学问的看法，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西式人才需求。这恰恰为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展教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如同冯桂芬在《上海设同文馆议》中所提及的那样：“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且多习天主教。”^[2]即便面临诸多挑战与质疑，传教士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办学，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西学人才。传教士的办学行动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不乏有文化侵略的动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学者与领袖，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如今，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涌现出众多的教会大学校友会，如燕京大学校友会等，而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在继续开办教会大学，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天主教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这些机构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更在为今日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因此，对教会大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两岸三地的教育接轨，更能让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教育的演变与发展。

自 1877 年至 20 世纪初，教会大学的发展终于取得了显著进步，标志着中国首批教会大学的诞生。这些学校不仅遵循西方教育模式，构建了正式的教学体制，而且在专业化与正规化的双重保障下，形成了覆盖小学至大学的全面教育体系，堪称近代中国西式教育的滥觞，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基石。

2 教会大学兴起过程

当教会小学取得显著发展后,中国社会亦经历巨大变革。在这个关键时刻,部分思想敏锐的传教士开始深思教会办学模式的局限性,探究为何教会学校未能取得更大进步的原因。这体现了传教士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思考。

传教士们并未因教会学校与学生数量的增长而满足于现状,他们明白只有不断追求进步,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事业的伟大使命。在观察到数量增长的同时,他们更敏锐地察觉到了教会大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他们深知缺乏现代、中文编写的教科书是制约教会学校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于是,在1877年,他们积极行动,发起了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第一次上海集会。在这次会议上,狄考文提出了提高教学水平、改革教学内容等迫切问题,并强调了教会学校传播西学的责任,包括编写世俗教科书的必要性。这一决策不仅推动了“益智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传教士将教育发展提上了重要议程。“益智书会”的成立意味着传教士开始专注于编写满足教会学校需求的教科书,这标志着教会学校不再仅仅是布道站,而是向真正的学校教育——基督教教育迈进。而在这些由益智书会自己编辑出版的教科书中,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The Outline Series”)和《格物图说》(“The Hand-book Series”)无疑是最为出色和具有影响力的。^[3]这两套丛书不仅成为了教会学校的基本科学教科书,更在晚清政府实施新学制后,成为了各地学校广泛采用的新式教科书,^[4]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努力不仅展现了传教士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和投入,也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教会学校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但它们在管理上却显得一盘散沙,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标准的学术及考试准则。各差会间不仅未能形成合力,反而存在着互相指责的现象。西方传教士在深入教育实践后,深刻意识到单靠个体的努力,难以解决教会教育面临的诸多挑战。他们急需一个能够汇集集体智慧、共同探讨教育诸多层面的专业性团体。因此,在1890年5月,第二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隆重召开。此次大会以长远眼光审视了教会教育的未来发展,决定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新组织,英文名为“The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中译为“中国教育会”,继续沿用原有的“益智书会”之名。^[5]这一组织的成立,无疑为教会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教育会的引导和协调下,教会学校开始积极整合资源,

优化教育结构,逐渐建立起一个以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为骨架,辅以各种形式的专门教育、特殊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全面而完整的基督教教育体系。这不仅标志着教会学校在教育体制上的飞跃发展,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程湘帆在他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之经过》中高度评价了益智书会编译的教科书。他指出,尽管从现今的角度看,这些教科书的价值可能有限,但在五十年前,它们无疑是创新的产物,为我国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些书籍涵盖了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逻辑等多个领域,不仅满足了当时教会学校的教学需求,而且对中国教育和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益智书会所编译的教科书在直接和间接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学逐渐成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这一现象在20世纪初的学堂热潮中得到了显著体现。伴随着“西学”的热潮,众多著名的教会大学纷纷崭露头角,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武昌的华中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福州的华南女大,协和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燕京女大,协和医大等,^[6]这些大学多由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形成了教育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然而,随着时代变迁,1926年国民政府曾禁止外国人办教会大学,标志着外国势力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管了外资津贴学校,彻底收回了教育主权,使教育真正回归本土,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了更多本土人才。这一历程见证了中国教育的自我觉醒与独立发展,也是国家走向强盛的重要基石。

3 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

3.1 前瞻性的课程体系构建

在教会大学的课程设计上,我们观察到一种微妙的转变。宗教内容的比重逐渐减少,而文化科学课程逐渐增加,这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调整,更是教会大学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重要体现。部分学校甚至开设了汉语课程,尽管其初衷可能是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一语言工具,更深入地理解和融合宗教与中国文化。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引入,一方面是为了吸引中国学生,保障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学生寻求救国手段的热情相呼应。对他们来说,进入教会大学,成为了他们接触西学的桥梁。这种转变使得教会大学的课

程体系更加凸显了西方大学重视实科教育的理念。同时,儒家学说的讲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使得更多的学生愿意选择进入教会大学学习。这样的转变不仅满足了教会大学培养神职人员的初衷,也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教育是教会大学与传统教育相比更具优势的关键所在。这些学校开设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如历史、地理、数学、几何、逻辑、伦理、天文等,让学生得以全面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其知识面远比当时中国的封建学塾宽广。马礼逊学堂的课程也体现了这一点,除了中文课外,还开设了包括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在内的丰富课程。这种课程设置不仅体现了学校的教育目标,更是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教会大学在教育领域的独特优势和前瞻性。

在教会学校中,外语教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主教学校以法语教学为主,而基督教学校则侧重于英语教育。这种对语言教育的重视不仅彰显了教会学校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独特见解,同时也为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例如,现代高校普遍重视外文教材的引进、英文授课、外教聘用、访问学者及留学生制度等,^[3]这些做法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教会大学的影响和启发。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学校之所以重视英语教育,一方面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西方宗教,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实生活对于多元化语言能力的实际需求。

在中国教育的传统观念中,学者们往往以挥毫泼墨、吟诗作赋为高尚之举,体育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教会大学的理念中,体育不仅是学生身心健康的基础,更是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学校,开创了将体育设为必修课的先河,强调体育学分的重要性,以此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足的体育锻炼。教会大学提供的体育项目繁多,从田径到球类,再到冰上运动,应有尽有。其中,不少项目都是教会大学首次引进中国的,为中国的体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3.2 支持性的师资与师生关系

教会大学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其卓越的师资阵容。外籍教师与中国教师的结合,构筑了高水平的教学环境。在社会环境的演变下,中国教师的比例逐渐攀升,这种“中西合璧”的师资结构,为教会大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确保了其在教学上的领先地位。教师来源广泛,颇有打开大门交流学术之意,以辅仁大学为例,该校教师来源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从当地著名大学聘请名师;二是吸收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三是不拘一格举用人才;四

是由教会选派的人员。

师生关系的和谐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至关重要。教会大学中的师生,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构建了独特的互动模式,这也在近代高等教育中独具魅力。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校长,管理学校严谨有序,但对待学生却充满关爱。他强调师生间的密切联系,常邀请学生至家中交流心得,这种温馨的互动氛围,对学生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3 开放性的招生对象

在晚清的封建社会中,“裹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盛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然而,教会大学却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女性打开了一扇窗。这些学校不仅招收女性学生,还为她们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突破性的做法无疑是对“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教会大学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在女子体育教学方面别具特色,开设了以舞蹈为基础的女子体育课程,并首创女生“体态矫正课程”,关注女生的形体美学。教会大学的体育课程不仅注重学生的身体锻炼,还强调体育在女子教育中的作用,燕京大学就将体育课程与女子教育相结合起来教学。

4 对现代学校教育的现实意义

过去,很多研究一直强调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导致中国人对传教士和办学活动充满敌意和否定。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传教士的活动中也存在积极的成分,尤其是在办学校方面。历史不能成为我们逃避现实责任的借口。如今,我们已经具备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条件,这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利于促进现实中外文化交流,有助于推动改革开放,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现实问题。对于过去的误解和偏见,我们需要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来重新认识和解读。只有正视这个问题,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引领我们走向未来。教会学校的办学活动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通过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掘教会学校在中国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历史是我们的镜子,只有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的挑战和机遇。

4.1 外语教育的人才摇篮

教会学校一直重视外语教育,许多早期的外语工作者都毕业于教会学校,他们拥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为日后在其他领域获得成功创造了良好条件。教会大学所倡

导的英语教学方法,例如语法翻译法和“古安系列”,至今仍在使用,并对英语教育产生深远影响。这种重视外语教育的传统,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教会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都能游刃有余。因此,教会学校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力不可忽视。

4.2 教育现代化的催化剂

教会学校为中国的教育带来了新的气息和模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革新,对近代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在逐渐失效,无法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教会学校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身心健康、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素养的培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于清朝时期僵化陈旧的封建教育,教会学校的教育理念更为现代化和优越。总的来看,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深远而不可低估的。教会学校的先进理念和教学方法为中国的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其强调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培养的教育方式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带来了积极的启示和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教会学校的教育模式为中国引入了一种新的教育典范,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4.3 贫困学生的教育绿洲

教会学校为部分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这对个人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学校为那些本来无法承担高昂学费的贫困家庭子女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帮助他们接受优质教育。正是这样的机会,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如顾颉刚、林语堂、周有光、张爱玲、赛珍珠等。这些人才不仅为个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更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教会学校的存在,让更多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4.4 两岸学术的交流纽带

教会大学作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研究中有着深远的价值,也在当前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学者可以通过对教会大学的研究,深入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并促进闽台学者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许多中国教会大学的师生移居中国台湾,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

这些教授和学生在中国台湾的教育、政府和工商界等领域工作,贡献良多。中国台湾目前也有一些基督教大学,如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真理大学等,延续着教会大学的传统。自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恢复以来,中国台湾基督教学者也积极访问大陆,寻根探源。^[7]

当前,中国历史学者有必要拓展思维,重新审视教会大学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以提升大学教育的现代化水平。教会大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不容忽视,它们承载着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痕迹,反映出教育理念的演变和变革。通过深入研究教会大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教育事业的进步。同时,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有助于促进学术互动,从而为历史研究和教育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未来,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其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文化底蕴将会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只有不断完善教会大学的研究和传承工作,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教会大学的办学精神和理念,推动中国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事业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and 智慧。

参考文献

-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3
- [2]陈明远.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J].社会科学论坛,2013,(08):22-40.
- [3]张美平.益智书会教科书的编译及其影响[J].翻译论坛,2018,(02):61-66.
- [4]张雪峰.试论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及其影响[J].图书与情报,2005,(02):71-73+78.
- [5]董雪梅.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J].理论学刊,2006,(07):100-103.
- [6]黄金刚,韦福安.晚清教会学校探析[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03):101-104.
- [7]吴梓明.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再审视[J].海峡教育研究,2016(1):64-71.

作者简介:姓名王颢清(出生年份1994—),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具体到福建省省漳州市),职务/职称讲师,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漳州理工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教育学。